

全球智库半月谈

发动基建热潮：求助私人部门

欧洲央行应关注区域通胀差异么？

关于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议题的小组讨论

中国采取新标准核算 GDP：对增长、收入和生产率的影响

中国的挑战：如何民进党退

习近平的印度之行是否会带来重大突破？

本期编译

杜哲元

郭 楚

郭子睿

黄杨荔

李 想

李 骁

刘 洁

刘仕国

刘天培

刘兴坤

沈仲凯

苏 丹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发动基建热潮：求助私人部门 4

导读：眼下，全球经济萎靡不振，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不见效。对此，本文提出了一项“处方”：减免私人部门税收，促使其投向基础设施项目，从而刺激经济。

欧元区是否存在自我强化的通货紧缩风险 6

导读：文章基于菲利普斯曲线视角，分析了欧元区产出缺口、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其它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并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做对比。本文认为欧元区发生自我加强型通货紧缩的风险不大。

全球治理

欧洲经济震荡的早期预警 9

导读：本文预期欧洲经济会发生动荡，主要是因为德国经济持续衰退。欧洲很有可能陷入实质通货紧缩困境，外围经济国家陷入通货紧缩疲劳状态，全球流动性趋于收紧。因此，欧洲决策者应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使欧洲经济步入复苏。

欧洲央行应关注区域通胀差异么？..... 11

导读：货币联盟内部区域通胀率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欧元区内部这种差异尤为显著。通胀差异可能是低实际利率导致需求及信贷的不可持续性与市场分割，从而扭曲经济的结果。因此，将平均通胀率维持在约为 2% 的水平十分关键，否则可能导致欧盟部分地区出现通缩，危及区域性金融和价格稳定。本文认为，欧洲央行利用单一利率工具无法调节通胀差异，宏观审慎政策新工具可能也无法实际解决通胀差异。欧洲央行应当采取非传统政策措施，通过所选工具在不同国家实施不同影响，减少差异并确保货币政策正确传导。

警惕“另类”通胀 13

导读：美国劳工统计局在 1980 与 1990 年更换了通胀统计的口径与方法。本文发现，如果按照当时的方法统计我们的 GDP 与通胀率，美国真实 GDP 实际在缩水。这种“另类”通胀应该引起政府与学界的警惕。

经济政策

关于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议题的小组讨论 15

导读：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借贷成本低廉，在其他措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或许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增加就业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会议于 IMF-世行年会前夕举行。该会议汇聚了包括政策制定者、学者、智囊团代表以及国际组织在内的多方人员，就如何促进并维护就业与包容性增长作出讨论。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其他结构性改革、社会不公以及青年失业等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

欧盟银行的去杠杆过程 18

导读: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各银行已经开始通过去杠杆来修正此前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并且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本文认为,对去杠杆过程的管理失当可能危及经济复苏。本文作者发现股权上升比资产降低的作用大得多,并建议加快处理坏账。

聚焦中国**中国采取新标准核算 GDP: 对增长、收入和生产率的影响 23**

导读:中国正在试用 SNA2008 标准核算 GDP,包括将研发支出视作资本形成。这将提高中国 GDP 的水平、研发的强度和投资对增长的贡献,降低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恶化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总的说来,从净影响来看,本次修订对中国来说是正面的。

中国的挑战: 如何民进国退 26

导读:本文分析了中国政府及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认为经济繁荣不仅与经济自由度高度相关,提高经济自由度也能极大地放宽消费者的选择面;反之,对国企的过度扶持,对利率汇率的限制都是低效率的。中国应深化改革,加强市场的主导力量。

中国最低工资的“清理”作用 28

导读:许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于就业影响很小,对此常规的解释包括人员流动率的降低,产品加成的下降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些原因都将部分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冲击。本文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对于那些高速增长的国家有一定“清理作用”——即使得低效率企业被高效率企业取代,同时在位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两个渠道都将使得整体生产率提升。

战略观察**习近平的印度之行是否会带来重大突破? 30**

导读:过去的十年里,中印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改善。而习近平近期对印度的访问亦普遍被认为将产生重要成果。目前,对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最有利的因素是印度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而印度新任总理莫迪也颇为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它对印度的重要意义。但中印两国仍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领土和地缘政治方面。在此次访问中,中印两国领导人批准中国在印度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增进两国关系的一个必要而合适的切入点。

亚太系列峰会应对亚洲系列挑战 32

导读:2014年10月16日美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表文章《亚太系列峰会应对亚洲系列挑战》,作者文章中指出,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Tpp)、南海问题和缅甸问题是美亚太战略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美应利用总统出席亚太系列峰会的机会推动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并给出了作者的具体建议。

阿拉伯的夏天: 灼热的高温还是猛增的暴力? 35

导读:在阿拉伯世界,2014年的夏天被证明是极其充满暴力。伊斯兰国(IS)占领了伊

拉克的大片土地并开始进行野蛮的行动（从教派或种族清洗到斩首人质）；民兵组织的暴力困扰着利比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镇压了哈马斯；而叙利亚的大屠杀仍未消减。然而，这一年对暴力的阻止，毫无例外地伴随着该地区似乎正在遵循的一种暂时性模式，这种模式在6月到9月间以回归冲突作为热点。1967年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战争发生在6月；伊拉克与伊朗之间漫长而持续的战争发生在1980年9月；以色列在1982年6月进攻了黎巴嫩（2006年7月再次进攻）；而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8月入侵了科威特。政变似乎也发生在夏季的几个月中：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和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1952年7月推翻了埃及的帝制；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国王分别在1958年7月和1969年9月倒台；而毛里塔尼亚见证了总统在2005年和2008年8月被驱逐。相似地，埃及总统穆尔西的下台发生在去年7月。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有一种明确的观点：一旦庄稼丰收，地面战斗就开始了（正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那样）。但是，除了这种观点之外，是否在高温和暴力的盛行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本文由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弗洛伦斯·高波撰写。

本期智库介绍..... 38

发动基建热潮：求助私人部门

Gary Clyde Hufbauer 和 Tyler Moran/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眼下，全球经济萎靡不振，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不见效。对此，本文提出了一项“处方”：减免私人部门税收，促使其投向基础设施项目，从而刺激经济。编译如下：

当全球经济遇冷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似乎都不见效。宽松的货币政策抬高了债券、股票及住宅价格，但在提升工资、改善就业方面则帮助不大。另一方面，财政扩张受限于政治而非经济。赤字鹰派在德国等许多国家都占据优势，“凯恩斯”在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圈子中已成为贬义词。

为应对政策失灵，参加 IMF 年会的幕后操纵者们重新发掘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价值。发达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已经超负荷运作，且在不断地恶化，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量还远远不够。基建投资的经济回报远高于长期债券利率，而且，基础设施项目会雇佣大量工人，包括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这正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这些事实早已广为人知。

为强调基础设施支出的作用，一份 IMF 报告给出了如下计算结果：将 1 美元投入生产型项目，能获得 3 美元的额外产出，而且这 1 美元的成本可通过未来的税收收入实现自我支付。正如前美国财政部长、白宫经济顾问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强调的那样，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基础设施支出是众所周知的免费午餐。额外增加 1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年支出——约占全球 GDP (75 万亿美元) 的 1.3%，将为糟糕的全球经济创造奇迹。

那么，还有什么阻拦在前方？两件事：钱太少，审批太慢。对于缩短审批流程，我们没有很好的处方——奥巴马政府拖延了 6 年才给拱心石石油管道 (Keystone pipeline) 开绿灯。与目前的流程不同，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反对者在占据上风前，应该担负起更重大的举证责任。然而，简化审批流程要求各层政府间通力协作，快速改革或许只是过高的期望。

关于钱的问题，我们确实有个好处方。若能为基础设施募集到更多资金，项目或许能得到更快的审批。以美国为例，我们阐释了这一处方，它也很容易被改造应用于其他国家。

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应立即对将资金投放于受认证的基础设施的私募基金减免全部联邦税，无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预期长度是 5 年还是 10 年。为获取财务收益，私人投资者会对基础设施项目收费。因此，可在一段试用期内(比如 5 年)核销征税，以检验该措施能否成功地刺激经济、缓解基础设施紧张的局面，实现对荒废道路、桥梁等的修复。

美国国会的税收联合委员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新的税收减免措施可能加剧财政赤字。然而，IMF的“支付计算”可解决这一担忧。适当的认证不仅能挑选出值得实施的基建项目，还能保证私募基金参与其中。证书可由交通和能源部、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陆军工程兵团等机构颁发。尽管认证并不便宜也不简单，在政策背景、环境等方面的支持下，认证程序将能迅速地进行。

在美国的政治背景下，与财政部提出的基础设施融资措施相比，我们的处方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财政部想对总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征收巨额的公司所得税（税基超过2万亿美元），利用这些税金为道路、桥梁、港口的修筑融资。然而，该设想与其他国家的税收体系格格不入，因而在国会上被否决了。该设想无论能给美国的基础设施带来多大好处，都会削弱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降低净效益。

相反，我们的处方统一了美国企业的利益与美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能会自愿将数千亿美元海外收入送回国内，因为大规模而直接的税收减免将抵消此举产生的额外联邦税。而那些没有海外分部的美国企业，则可能从其在国内的现金储备中抽出部分投资于基建项目，以获取比商业票据更高的收益。

总之，现在是美国乃至全球发动基建热潮的好时机。货币政策已经黔驴技穷，而对财政政策的政治约束则使有价值的基建项目衰败凋零。通过立即减税来利用私人资金，是改变全球经济萎靡的一项可行措施。

本文原题为“To Unleash an Infrastructure Boom, Turn to the Private Sector”。本文作者为PIIE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10月16日刊于PIIE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元区是否存在自我强化的通货紧缩风险

Volker Wieland 和 Maik Wolters /文 郭子睿/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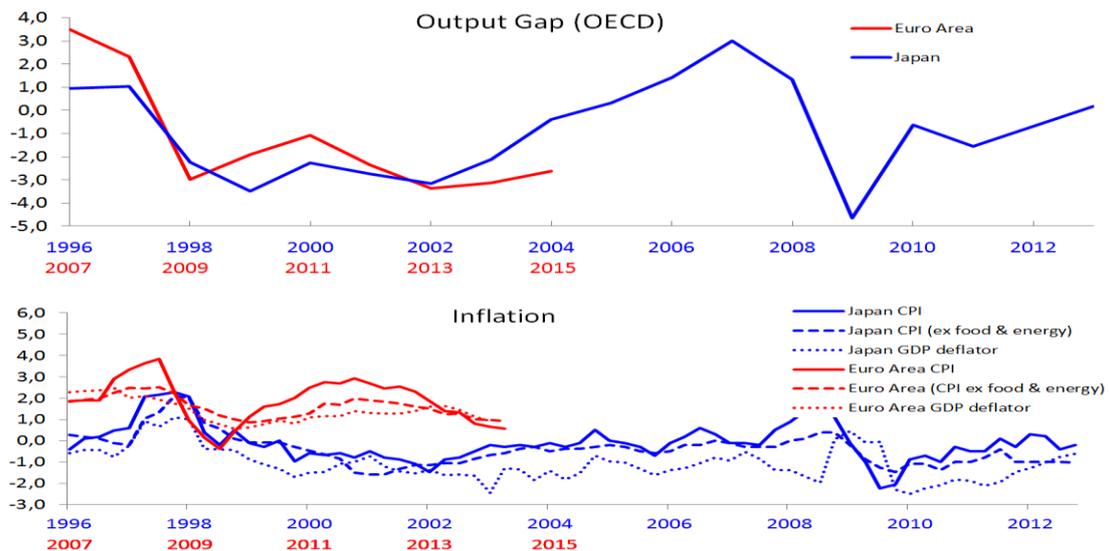
导读：文章基于菲利普斯曲线视角，分析了欧元区产出缺口、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其它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并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做对比。本文认为欧元区发生自我加强型通货紧缩的风险不大。编译如下：

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CPI）在 2011 年底时高达 3%，但到 2013 年初时已经降到欧洲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值 2% 以下。从 2013 年 10 月，欧元区 CPI 一直在 0.3% 至 0.8% 之间徘徊。这么低的通货膨胀率只有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萧条期（2009 年 5 月至 10 月）出现过。而且，欧元区的产出也远低于潜在产出，这意味着在中期内欧元区的产出缺口一直为负。

目前通货膨胀的下降以及经济的疲软引起了政界、媒体关于警惕通货紧缩以及自我加强螺旋式通货紧缩与萧条的讨论。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在 9 月份已经启动量化宽松政策，但他们仍然号召采取其他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方式来抵抗通货紧缩风险。但本文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了产出缺口、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其它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并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做比较，认为欧元区发生自我加强型通货紧缩的风险不大。

1、欧元区与日本关于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比较

图 1 欧元区与日本关于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比较



由上图可看，日本的数据从 1996 年开始，欧元区从 2007 年开始。日本在 1998 年-2004 年间产出缺口为负，通货膨胀率从 1998 年开始下降，并在 1999

年出现负增长。2002年第一季度通货紧缩最为明显，CPI增长率为-1.4%。尽管产出的负缺口这么大，但是日本的经济并没有陷入螺旋式的通货紧缩。恰恰相反，日本的通货紧缩相当温和，从2002年-2004年日本的CPI平均是-0.38%。欧元区2007年-2015年的产出缺口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类似，通货膨胀率还要略高一些。因此，欧元区出现螺旋式通货紧缩的风险并没有当初日本的概率大。欧元区不太可能出现自我加强型的通货紧缩。

2、欧元区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可知，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对当前的通货膨胀有显著的影响。我们分析了来自欧洲中央银行，专业机构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我们发现：第一，他们认为未来通货膨胀率是下降的，且都低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很少是负增长的，即便是出现负增长也是不连续的，不会出现螺旋式紧缩。

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欧洲的经济是逐渐复苏的，国内需求逐步提高，国外需求也不断增加。未来通货膨胀一定会反弹，欧元区不会出现自我加强型的通货紧缩。

3、影响通货膨胀的其它因素

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可知，我们还需要讨论剔除通货膨胀预期、产出缺口的其它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比如能源价格、汇率变化等因素。

从图1可见，剔除掉能源和食品因素的核心CPI指数要远远低于CPI指数。事实上，自从2011年底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下降80%源于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下降。但是，由于现在地缘政治冲突的缓和，能源价格未来上升的可能性较大。

至于汇率变动，我们不是观察双边汇率，而是多边加成汇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自从2014年3月，欧元已经贬值4%。欧元的贬值可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刺激出口，这可以进一步避免欧元区陷入通货紧缩。

另外，饱受债务危机影响的欧元区国家也在逐步复苏，这些国家可贸易品的价格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事实上，这几个国家的核心CPI要低于欧元区的平均CPI。随着他们经济的复苏，物价也会进一步上升，这有助于欧元区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

4、结论

通过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比，我们分析了产出缺口以及通货膨胀趋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分析了通货膨胀预期，汇率变动，能源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认为欧元区陷入自我加强型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不大。对

于号召欧洲中央银行实施额外的宽松货币政策我们并不认同。毕竟，欧洲中央银行已经降低再融资利率 15 个基点，实施了负的存款利率，而且在 2014 年 9 月实施长期再融资操作以较低的成本为银行提供流动性。欧央行的这些措施会导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我们应该等待这些措施发挥作用。

本文原题为“Is there a Threat of Self-Reinforcing Deflation in the Euro Area? A View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Phillips Curve”。本文作者 Volker 为货币金融稳定局的主席，Maik 为 Kiel 大学宏观经济学的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9 月被 Kiel 世界经济研究所出版。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经济震荡的早期预警

Desmond Lachman /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本文预期欧洲经济会发生动荡，主要是因为德国经济持续衰退。欧洲很有可能陷入实质通货紧缩困境，外围经济国家陷入通货紧缩疲劳状态，全球流动性趋于收紧。因此，欧洲决策者应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使欧洲经济步入复苏。编译如下：

德国近期的经济衰退令欧元区忧心忡忡，因为导致德国经济低迷的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失。这当然也与不断升级的经济制裁的结果相符。这源于西方世界、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对峙、中东局势的持续动荡及多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显著的经济衰退。

然而，另一个预测欧洲很快会发生下一轮主权债务危机的早期预警指出，欧洲正在陷入完全的价格通缩。欧洲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政策目标为接近2%，但是整个欧洲地区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0.3%。同时，欧洲大多数负债累累的经济外围国家已经并正在继续陷入完全的价格通缩。糟糕的是，欧洲很有可能在短期内陷入实质通货紧缩的困境。因为欧洲经济已经历三次探底型衰退，其失业率已接近于二战后的创纪录高水平。

对于欧洲可能正在陷入完全的价格紧缩的预测，决策当局应敲响警钟。大多数欧洲经济外围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已非常高，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其公共债务水平占GDP已接近的140%。目前，我们已经错过调整这样的债务水平的最佳时期，很难再降低到更加可持续的水平。并且，在恶化这些国家公共财政的经济衰退或者加剧债务负担的完全价格通缩紧的情况下，这样的债务水平是几乎不可能再降低。也许有人会希望欧洲决策者们能够意识到，这样高的债务水平会导致欧洲外围国家易于遭受未来全球流动性紧缩状况的影响，因为美国联邦储备明年可能会着手采取常规化利率政策。

另一个关于欧洲债务融资问题的前期预警是外围经济国家陷入紧缩疲劳状态。在经历了多年经济紧缩和经济衰退之后，欧洲外围国家更不愿意继续实施财政紧缩和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这解释了为什么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已迫切地想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经济调整计划。应该警示的是，欧洲并没有做出关于经济调整计划的任何承诺，欧洲中央银行可能会无法在这些国家市场融资枯竭时帮助其脱离困境。

鉴于这么多的预警信号及全球流动性状况迅速紧缩，人们会认为，欧洲决策者应迅速做出决策，改变政策路径，转而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使欧洲经济步入复苏。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欧洲决策者根本没有改变政策的

任何动向。事实上，在回应欧洲中央银行马里奥 德拉吉主席关于放松欧洲财政政策的呼吁时，德国决策机构坚持认为，欧洲应坚持其财政政策路径、货币政策正统和结构性经济改革。这让我们想起了，前些年那些倒霉的意大利地震学家，他们没有对即将发生的地震提出预警，尽管大量前期预警迹象表明地震会发生。

本文原题为“Early-warning tremors in the European economy”。本文作者为 AEI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AE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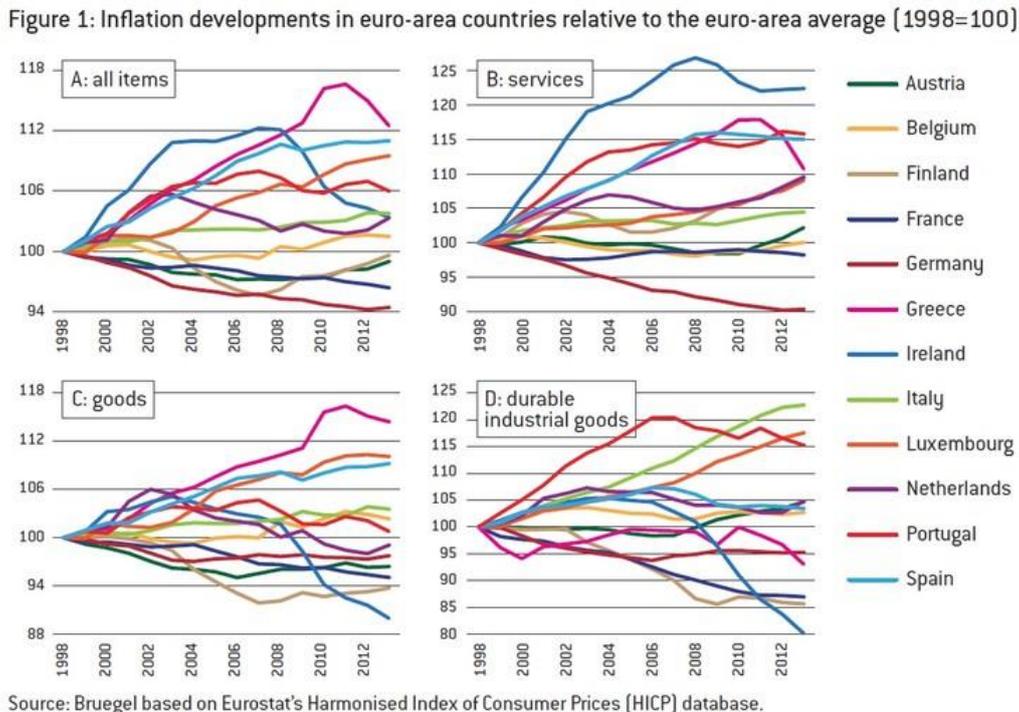
欧洲央行应关注区域通胀差异么？

Zsolt Darvas和Guntram Wolff /文 苏丹/编译

导读：货币联盟内部区域通胀率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欧元区内部这种差异尤为显著。通胀差异可能是低实际利率导致需求及信贷的不可持续性与市场分割，从而扭曲经济的结果。因此，将平均通胀率维持在约为 2% 的水平十分关键，否则可能导致欧盟部分地区出现通缩，危及区域性金融和价格稳定。本文认为，欧洲央行利用单一利率工具无法调节通胀差异，宏观审慎政策新工具可能也无法实际解决通胀差异。欧洲央行应当采取非传统政策措施，通过所选工具在不同国家实施不同影响，减少差异并确保货币政策正确传导。编译如下：

在货币联盟区域内，不同区域通胀率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在欧元区，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通胀率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例如，1998 至 2013 年间，圣地亚哥地区的价格相对于平均水平增长了大约 9.1%，然而亚特兰大地区的价格则下降了 6.1%。欧元区内部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1998 至 2011 年间，德国的价格相对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下降了 5.5%，然而希腊的价格水平则上升了 16.6%。这种差别在上述国家或地区内部是持续存在的，在欧元区内部尤为显著。

图 1 1998-2011 年间欧元区内部不同地区的通胀率水平



通胀率的差别既可能是由于诸如价格趋同或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等正常调整过程，也可能是因为各区域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例如在那些正经

历经济衰退、失业率不断增高的地区，通常来说价格水平的提高幅度会比较小。此外，地区之间不同的消费结构也可以解释通胀率水平上的差异。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通胀差异也可能是低的实际利率导致需求及信贷的不可持续性与市场分割，从而扭曲经济的结果。全球危机发生之前，需求和信贷迅速扩张的影响被高通胀水平进一步加大，显著降低了实际利率水平，使得借贷行为变得更便宜，从而带来信贷和需求不可持续的增加。

正常时期，欧洲央行利用单一利率工具无法调节通胀差异，也不会通过单一利率工具影响单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很多学术文章都表明欧元区不同国家内部货币传导机制是可以互相比较的。在危机时期，不同地区央行可以根据其自身资产负债表强度和主权债务基本面情况的不同，使用诸如“主要再融资操作”(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和“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 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等流动性操作手段。这些政策可以帮助缓解金融体系内部失效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欧洲央行可以采取非传统政策措施，通过所选工具在不同国家实施不同影响，以减少差异，并确保货币政策正确传导。例如，欧洲央行的资产收购行为可以给内部不同国家带来不同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资产在不同地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这些类似的手段被用作降低市场分裂程度，并改善政策传导机制。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宏观审慎政策新工具无法实际解决通胀差异。

总的来说，要解决地区之间不可持续的通胀差异，主要责任还是在于各个国家决策者以及一些监管机构。将平均通胀率维持在 2% 左右的水平十分关键，否则通胀差异可能导致欧盟部分地区陷入通缩，危及区域性金融和价格稳定。欧洲央行也可以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去引导全范围内通胀率或者处理金融市场分裂问题。

本文原题为“*So far apart and yet so close: Should the ECB care about inflation differentials?*”，作者 Zsolt Darvas 为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高级研究员，Guntram Wolff 为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主任。本文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警惕“另类”通胀

Stan Veuger /文 刘天培/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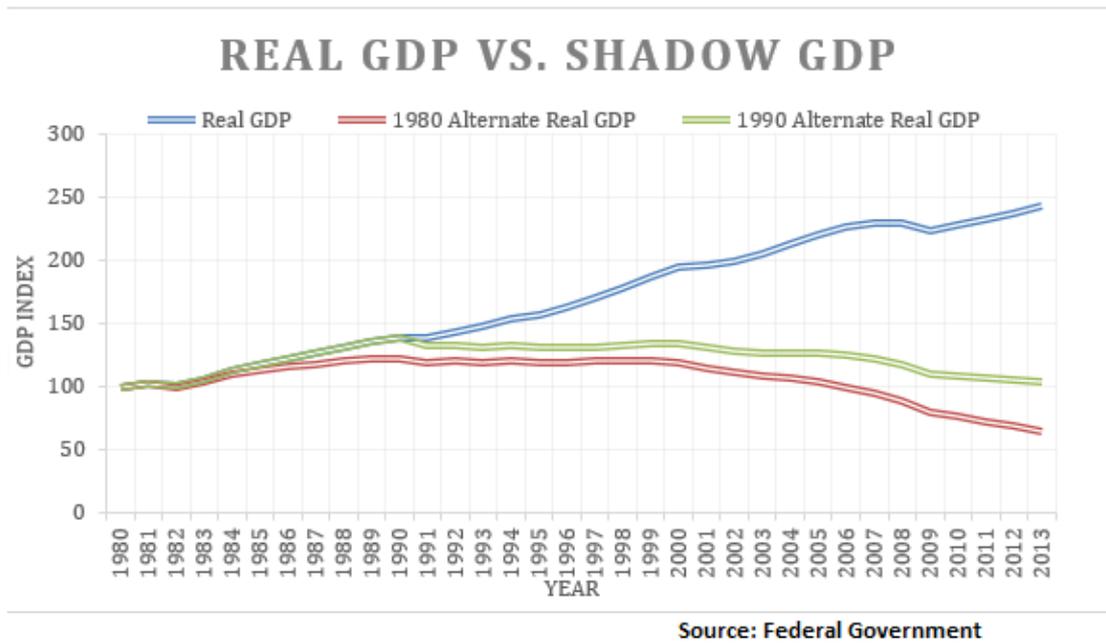
导读：美国劳工统计局在 1980 与 1990 年更换了通胀统计的口径与方法。本文发现，如果按照当时的方法统计我们的 GDP 与通胀率，美国真实 GDP 实际在缩水。这种“另类”通胀应该引起政府与学界的警惕。编译如下：

2007年，奥巴马在参与总统选举时，在爱荷华州曾说：“我不会假装自己懂得农业的每一个问题。”之后他转向群众：“大家去看看全食超市买芝麻菜的价格吧！这要价确实太高了。”对于许多人来说，通货膨胀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有些人过于激进了。他们认为，物价变贵不是市场调节的问题，而是政府发了太多的货币，劳工统计局一定是暗地修改了通胀的数字。那么，他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网站“ShadowStats”发布了另类的通胀测量方案，其中应用了劳工局以前使用的方法。他们忽略了消费者的偏好一直在变动，以及iPhone之类的产品所用的原料在1980年根本不存在这两个事实。这种统计口径看上去很有问题，所以他们通过某种方法试图修正。以1990年为基数，通胀率应该再加上3.75个百分点。以1980年为基数，通胀率应该每年再加1%。

接下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调整的含义。如果通胀真的比我们想象的高，我们认为能买的东西其实变少了，真实GDP的增长也变小了。那么这些调整的幅度是否很显著呢？经过仔细的计算，我将结果列在了图1之中。图1明显地显示了我们其实相当贫穷。如果使用1980年的统计方案，我们只有现在一半富有。表面上看，这个结果极其荒谬。但它吸引了一些保守派学者的支持。他们担心我们现在应用的统计方法过于宽松，让我们对真正的问题放松了警惕。“另类通胀”值得我们仔细反思。

图 1 真实GDP与影子GDP



数据来源：联邦政府

本文原题为“Be sensible about 'alternate inflation’”。本文作者为 AEI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AE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关于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议题的小组讨论

——IMF-世行年会

IMF Survey/文 刘洁/编译

导读：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借贷成本低廉，在其他措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或许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增加就业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会议于 IMF-世行年会前夕举行。该会议汇聚了包括政策制定者、学者、智囊团代表以及国际组织在内的多方人员，就如何促进并维护就业与包容性增长作出讨论。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其他结构性改革、社会不公以及青年失业等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编译如下：

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借贷成本低廉，在其他措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或许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基础设施投资与其他的结构性改革、社会不公、以及频发的青年失业问题成为“增加就业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会议讨论的焦点。该会在 IMF-世行年会前夕举行，汇聚了包括政策制定者、学者、智囊团代表以及国际组织在内的多方人员，就如何促进并维护就业与包容性增长作出讨论。

“当下存在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即全球将重新陷入一段时期的低水平增长，”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到。“鉴于这一风险，我们不能自满。”

1、高增长时代已经终结

拉加德称当前有几个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挑战令人担忧。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失业率高达 8.5%，年轻人的失业率为 13%。此外，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临界水平。“世界上最富有的 85 人与世界上最贫困的 35 亿人拥有同样的财富”，她说。

第一轮会话“强劲且持续增长的必要性”提到了上述问题，该对话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Adam Posen)主持。

“在经济未增长的情况下，不当的收入分配将导致有人受到损失”纽约大学的小组成员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说。“而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当的收入分配至少会使每个人的收入水平维持上升态势，只是速度有所不同罢了。”

他说美国增长远低于其潜力，因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方面投资不够。

耶鲁大学的 Ernesto Zedillo 也将平庸的经济前景归咎于平庸的政策，并认为许多国家存在“巨大的自满心态”。“那个依赖中国或美国就能实现增长的轻松时代已经终结了，”他警告说。

2、基础设施——但代价是什么？

IMF 副总裁筱原尚之 (Naoyuki Shinohara) 在另一个题为“公共债务、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会议上指出，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就是基础设施瓶颈。

根据 IMF2014 年的世界经济展望，基础设施投资的水平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大幅下降。尽管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但发达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上甚至也出现了明显的恶化。

Shinohara 说，现在是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的好时机，因为此类投资的资金成本较低，产出缺口大。“如果我们能满足某些条件，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会增进国家的增长潜力。”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小组成员克里斯蒂娜·罗默 (Christina Romer) 支持 IMF 的观点，但同时指出这样的政策还需要再权衡。“这种增长的代价会不会是某些对经济有利的东西？比如教育和研发？”她问。

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 (Kenneth Rogoff) 也认为在合适条件下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好建议。“但是投资什么设施？”他问道。“电网或廉价的宽带吗？我们可选的机构还有哪些？”

研究表明，债务与 GDP 的比率高于一定阈值往往与低水平增长有关，主持人吉莉安·邵蒂 (Gillian Tett) 说。那么究竟是为公共基础设施融资，但增加国家债务更好呢，还是尽量削减债务更好？

“公共基础设施是好的，如果它真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罗格夫回应道。“但问题是，你如何调整你的增长速度以控制债务，以及如何制定一个退出战略。”关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们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他说。

3、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

在一轮题为“增长和改革的挑战”会话中，定期讨论上述权衡事宜的决策者们都基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改革等方面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尼日利亚财政部长 Ngoziakonjo - iweala 强调应当优先支出。“拥有一个有限的钱包是痛苦的，”她说，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必须确定什么将产生最高回报，并确定什么是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她预测，尼日利亚对电力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许能使经济再增长 2%。

印尼财政部长 Muhammad ChatibBasri 谈到改革需获得民众支持，比如该国最近推进的减少能源补贴的改革。“改革的问题是，这个过程是即时的，但收益总是在中期才能实现。”

南非财政部长 Nhlanhla Nene 也同意他的说法，并指出南非面临失业、不平等和贫穷三大挑战。他谈到南非通过建立企业雇佣年轻人的激励机制来增加就业的计划。“有些时候你必须采取痛苦的决定，”他说，“没有痛苦，你不太可能解决的问题。”

IMF 副总裁朱民说，这样的改革虽然痛苦，却对于各国度过其发展边缘来说至关重要。

4、降低不平等程度

在一轮题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会话中，小组成员讨论了收入不平等问题。与会者指出，各国在激励和再分配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强大力量作用之下。

大多数小组成员同意通过分配政策降低不平等程度将不会影响经济增长，还讨论了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降低不平等程度。

在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时，全球发展中心的南希·波索尔（Nancy Birdsall）表示，IMF 可以与各国合作加强国家税收管理。此外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税收收入的空间，如提高纳税水平，尤其是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可行税收制度的缺乏会酿成不平等问题，她说。

其他小组成员引用了 IMF 近期的研究成果，如 Jonathan Ostry, Andrew Berg, 以及 Charalambos Tsangarides 等人的研究。布鲁金斯学会的 Justin Wolfers 表示，在 20 世纪 80 年代，IMF 的研究都是关于财政紧缩。“IMF 近年来的巨大转向令人震惊。目前，我们从 IMF 内部得到了可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财政方案。”

本文原题为“Panel Debates Moves to Spur Growth, Create Jobs”，作者为 IMF survey 杂志。
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盟银行的去杠杆过程

Pierluigi Bologna, Arianna Miglietta, Marianna Caccavaio /文 李想/编译

导读：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各银行已经开始通过去杠杆来修正此前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并且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本文认为，对去杠杆过程的管理失当可能危及经济复苏。本文作者发现股权上升比资产降低的作用大得多，并建议加快处理坏账。编译如下：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机构杠杆率不断上升的事实，使其备受关注。危机形成过程中，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攀升既是因为借贷活动增加，也是由于存在大量低成本资金。许多银行迅猛扩张，杠杆率高企，以至于“大而不倒”，与此同时也累积了大量风险。

为应对这些威胁，许多旨在逐步去杠杆的政策相继出台。除了这些调控政策，全球范围内观察到的向下调整也反映了债务和银行间市场趋紧的环境，以及修正危机前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政策制定者多次表达了支持资产负债表结构调整的想法，这有助于为银行服务经济创建出充足的条件。

然而，这一进程的实施还需要恰当的管理，以避免资产的无序抛售和调整期时间过长，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因此，从政策的角度看，明确当前的去杠杆程度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好坏影响，就显得至关重要。

图1 金融部门债务负担（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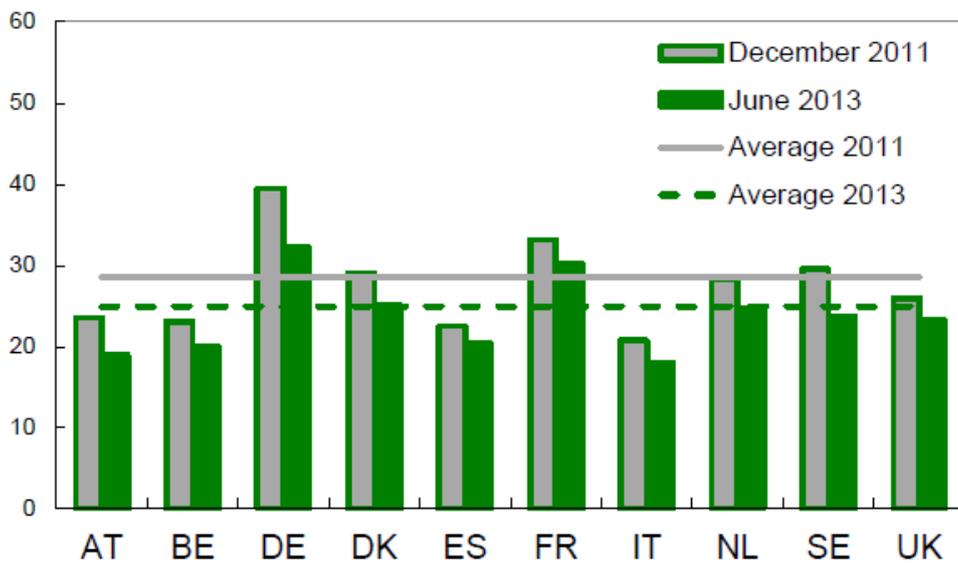
1、欧洲银行去杠杆的进程与形态

我们分析了欧洲一些银行去杠杆过程的主要特点，以探讨其时间和要素。我们还将它与美国最大银行的调整过程进行比较，以评价其前景。数据主要包含了43家银行，分布于奥地利、比利时、德国、丹麦、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典。它们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其资产平均占据了这些国家银行体系资产的79%，并且是欧洲银行管理局原始样本总资产的94%。数据的时间跨度是2007-2013年，为半年度数据，并且对于危机之后的2011-2013年有更为细节的信息。

t时期的杠杆率由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产（A）相对于普通股权益（E）的比值表示。我们认为普通股权益是银行实际净值的较好代理变量，因为它不受任何管制定义以及各国不同情况的影响。

从2011年12月到2013年6月，样本银行的平均杠杆率从28.6降到了25.0。总体而言，初值更高的银行在此期间的下降幅度最大。如图2所示，将这些银行按照国别加总，我们观察到，各国杠杆率均有下降。有趣的是，在2013年6月，杠杆率最高的是德国的银行（32.2），其次是法国（30.2），而最低的是意大利的银行（18.0）。

图2 各国银行的杠杆率



我们可以计算出杠杆率的变化中有多少归因于资产的变化，多少归因于权益的变化，从而分解出去杠杆过程的各组成要素。

从2011年12月到2013年6月，大多数去杠杆过程既发生在资产上也发生在权益上，其中权益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平均而言，普通股权益增加了9.6%，而资产降低了4.3%。图3的银行杠杆率变化散点图标示出了在去杠杆过程中两

种力量的相对大小。负变化表示有助于杠杆程度的下降，原因可能来自资产的减少或权益的增加，或二者皆有。相反，正的变化则代表更高的杠杆率，原因在于更高的资产或更低的权益，或二者同时发生。对角线下面的点表示去杠杆的银行，而上面的点则代表杠杆率上升的银行。

下一步是分析哪种类型的资产对于去杠杆过程贡献最大。来自资产减少的推力反映了私人部门证券和衍生品敞口 18.7% 的下降，以及消费者信贷 3.8% 的紧缩。有意思的是，对大多数银行来说，消费者信贷的减少只涉及到那些几乎不受受损资产影响的正常贷款，而受损资产则一般会增加。相比之下，主权敞口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推高了杠杆率。

图 3 欧洲银行去杠杆过程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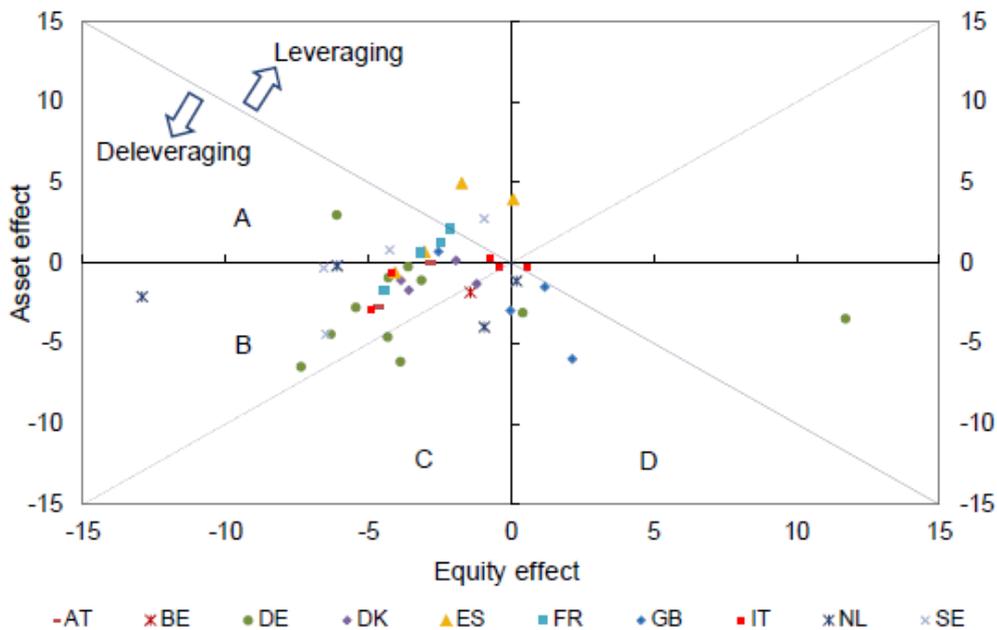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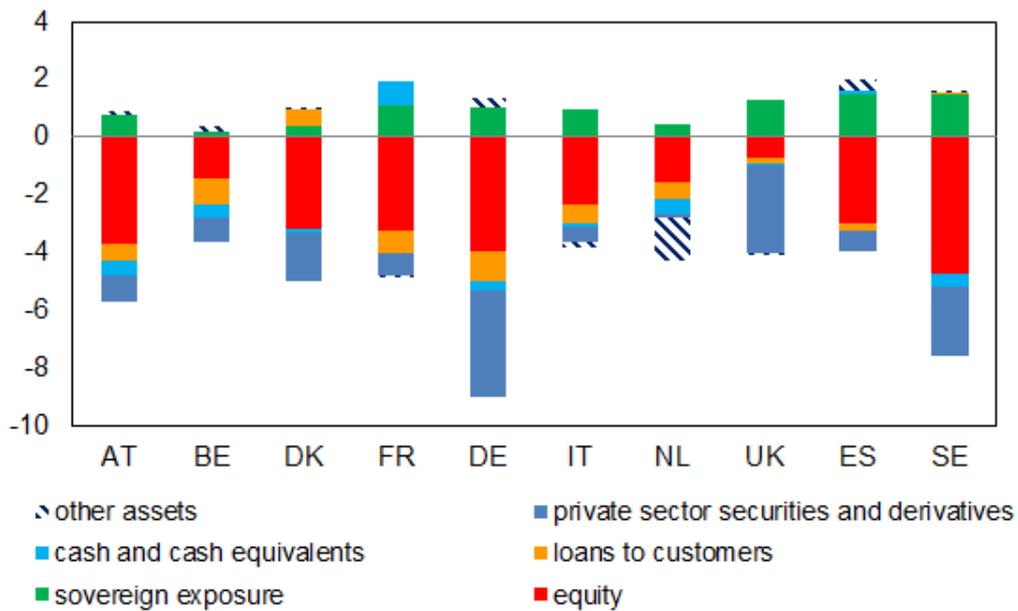


图 4 欧洲银行杠杆动态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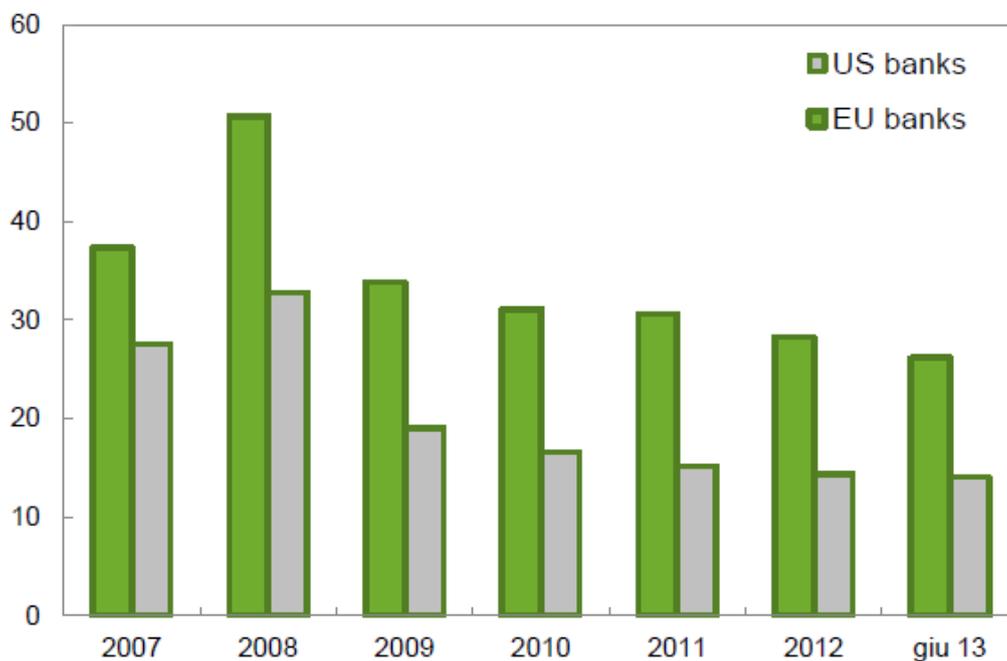


2、欧洲银行去杠杆的前景：需要更进一步去杠杆吗？

明确欧洲银行去杠杆进程的具体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政策制定尤为如此。因此，我们将样本银行与美国最大的十家银行进行比较，以明确未来是否还需要继续去杠杆。如图 5 所示，二者的杠杆率都相比 2008 年 12 月的最高值有所下降，虽然相比美国银行（从 32.8 下降到 14.1），欧洲银行的下降幅度更低（从 50.5 降到 26.1）。去杠杆规模的差异，加上欧洲当前的环境，意味着欧洲银行需要继续去杠杆进程。

假设分析的结果表明，我们样本银行的杠杆率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再降 17.2%，从 2013 年 6 月的水平降到 21.6 的目标值。这一目标值与美国最大银行的去杠杆过程保持一致。额外的去杠杆程度意味着资产缩减 17.3% 或权益增加 20.9%。一个更为现实的情形是，银行同时调整资产和权益，这需要 6.1% 的资产减少和 13.5% 的权益上升。

图 5 欧洲银行与美国银行的杠杆率



3、总结

迄今为止，欧洲银行已经显著降低了杠杆率。总体而言，去杠杆“好”的方面多过“坏”的方面，因为它大部分是由于提高普通权益而非降低资产而达成的。然而，欧洲银行的去杠杆过程可能将继续下去，其目的是重建稳定的金融环境并改善银行的偿付能力。

我们认为，由于资产负债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为达到更低的杠杆率水平，一个有效可行的策略是加快坏账的处理，同时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与此同时，资产的上升也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保持当前的去杠杆速度，欧洲银行或许能在 2015 年的上半年完成去杠杆过程，这一时间点与全面评估中保障银行应对任何资产不足的时间相吻合。

本文原题为“EU bank deleveraging”，三位作者均为意大利央行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采取新标准核算 GDP：对增长、收入和生产率的影响

Kent Troutman/文 刘仕国/编译

导读：中国正在试用 SNA2008 标准核算 GDP，包括将研发支出视作资本形成。这将提高中国 GDP 的水平、研发的强度和投资对增长的贡献，降低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恶化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总的说来，从净影响来看，本次修订对中国来说是正面的。编译如下：

2013年1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访谈中宣称，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将很快从旧标准SNA1993转向新标准SNA2008。新标准旨在调整GDP测度方式，以更好地反映生产、就业和资本积累性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到许多方面，包括军费支出的分类、水资源估价及其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登录。本次修订最主要的突破，在于将研发（R&D）尤其是信息通信部门（ICT）研发支出作为资本形成，而非中间消耗。

2013年7月，在美国商务部首次按SNA2008发布的第一批数据中，研发支出已作为最终需求——投资，即研发的资本化。同修订前相比，修订后的1929-2013年数据显示，GDP增速几乎没有实质变化，但GDP水平值除1929年外都有所上调。2014年，欧盟和韩国等许多其他国家都将转向SNA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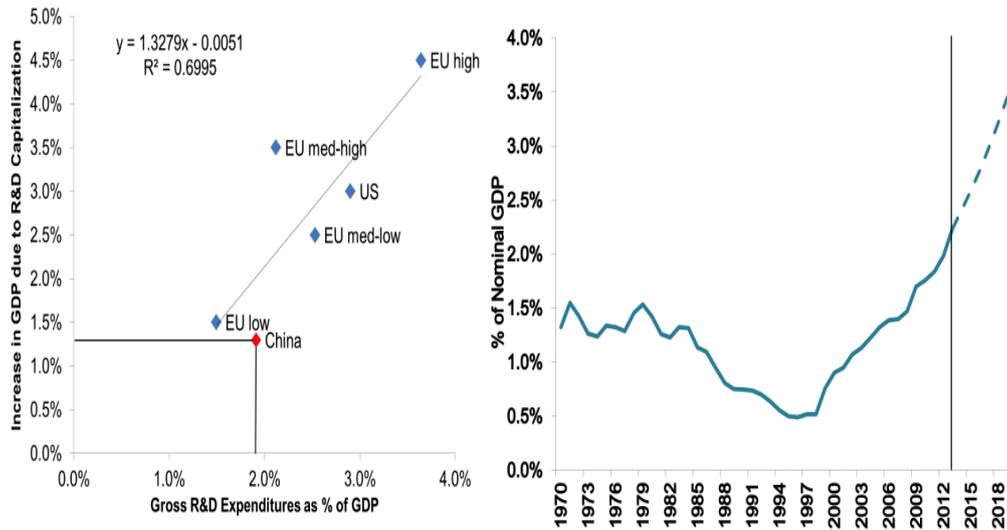
在访谈中，许宪春没有提及向SNA2008转轨的具体时间表。但是，今年GDP上半年报称GDP核算“当前正在转轨”，而去年下半年报则称“正在考虑转轨”。我们预计，某些改变最早将在2015年初就会执行。当然，并非SNA2008的所有修订建议都必须立即实施。

狭义地看，将研发投入视作无形资本纳入GDP中，将在如下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GDP的水平和波动；劳动收入份额；生产率。

1、对GDP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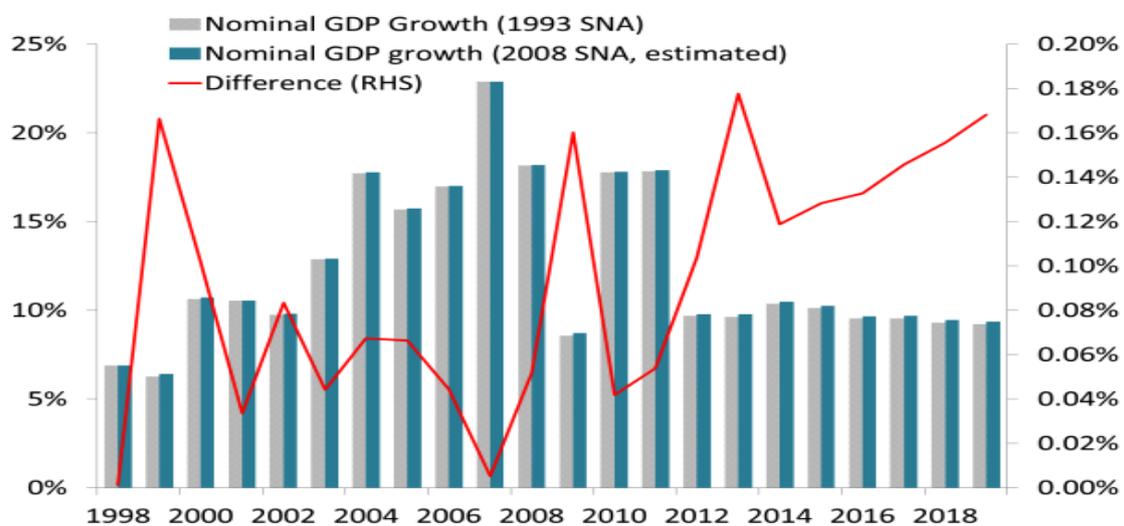
SNA转轨的最终影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执行哪些SNA2008标准，以及何时执行。将研发由中间品支出转为投资支出，对总收入和生产的影响取决于研发强度，即R&D/GDP（%）。中国的研发规模超过许多国家，但研发强度依然较低。测度中国创新成果的其他指标，比如人均专利（按研究者人数或国民人数）或人均出版物，在数值上仍落后于最发达的那些经济体，这同其发展中经济体身份是相称的。然而，中国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增速，均超过整个外部世界的水平，意味着中国研发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上升。

图 1 研发强度vs研发资本化对GDP的影响中国的研发强度，1970-2019年



在研发资本化核算后，中国2011年的GDP水平将上涨0.1%-0.2%，近年来的GDP增速也将发生类似变动。欧盟和OECD的几项研究显示，欧盟R&D/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研发将使GDP增长1.5%-4.5%；美国该数值约为3%。中国的研发效率相对较低，故该数值约为1.3%。基于该判断和IMF对中国GDP的估计（WEO）进行外推可知，中国的R&D/GDP从1997年开始逐渐上升，2011年增至1.8%，2018年将达3.5%。仅仅由于研发的加快增长，中国GDP增速在2019年会超过IMF预计数值0.15-0.2个百分点。

图 2 研发资本化前后，GDP名义增速的差异，1998-2019年



2、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一个议题是，修订GDP核算标准将改变各生产要素在收入中的份额。一般地，投资对收入的边际效应，超过劳动对收入的边际效应。换言之，等幅增加资本和劳动，资本所获收入超过劳动所获收入。把无形资产纳入资本范畴，会拉大资本-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本已扩大的分配差距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自1992年以来，在新标准下，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将比旧标准低0.05个百分点。该影响不算巨大，但在收入分配差距高企的背景下，扩大劳动者收入份额仍应置于政府政策的优先位置，包括供给方改革。

3、对生产率的影响

定量测度新标准对生产率的影响，比较困难。生产率一般用平均每个工时的产出来测度，可分解为三部分：劳工结构，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往通常假设其同其他生产要素存在互动效应）。研发如视为投资，其产出则属于资本深化效应，会减少劳动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95-2003年，研发的资本化使资本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从35%升至55%，但劳动的相应数值从14%降至11%，TFP的相应数值从51%降至35%。

总之，采用新的GDP核算标准，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这可以更好地反映经济活动事实，而不是统计部门在经济放缓之际粉饰统计数据。

本文原题为“China’s New GDP Measurement: Impact on Growth, Income, and Productivity”。作者 Kent Troutman 为 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师，主要研究国际货币政策；曾在高盛担任金融分析师。该文 2014 年 10 月 7 日发表于该机构官网的专栏“中国经济观察”。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挑战：如何民进国退

James A. Dorn/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本文分析了中国政府及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认为经济繁荣不仅与经济自由度高度相关，提高经济自由度也能极大地放宽消费者的选择面；反之，对国企的过度扶持，对利率汇率的限制都是低效率的。中国应深化改革，加强市场的主导力量。编译如下：

Nicholas R. Lardy 是举世闻名的中国专家，同时身兼彼得森国家经济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在其新书《民进国退》中，他作出了如下论断：中国高速增长的核心因素在于市场而非政府。1978年，北京开始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失败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自由和贸易的作用下，消费者的选择面得到了极大放宽。

然而，由政府主导的经济领域，尤其是服务业，仍然受到了较大政府影响。在北京，压低利率、汇率挂钩、强行资本管制、低价能源等种种手段扭曲了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此外，由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也将资金输送到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投入的大笔资金也带来了巨大的债务。与此同时，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帮助，而这恰恰是非政府主导的。

为了解决这些相关问题，2013年11月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下一步的自由化规划了蓝图。李克强总理承诺，要重新平衡经济发展，将投资型、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为全面发展、重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发展模式。通过加强对银行存款利率的限制并放松贷款、能源价格市场化、允许更大的汇率弹性、提升私人部门的作用，中国的领导人希望能够鼓励国内消费，并削减对出口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依赖。

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民进国退？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款，这将不是一件易事：任人唯亲导致国有银行的信用度低，控制汇率以迎合出口导向的发展，给予低效率的国企大量补贴，反垄断条款对“支柱”产业的保护，以及在投资决策中的政治化因素，都严重影响了中共的地方官员。

尽管李克强总理主张由市场导向配置资源，他依然将GDP增长率目标称为一种“法律约束”。然而，8月的工业增长率已降至6.9%，不仅低于7.5%的官方目标，也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如果今年的增长率最终低于目标（这很有可能），那将是1998年来首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国企的高投资、低回报不应再被纵容，否则经济效率将受到严重的影响。扩大非政府部门并加强竞争力，将有助于重新调配稀缺的资本，进而提升整体财富。

事实上，中国真正需要平衡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香港的“大市场、小政府”应当在大陆得到实施。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自由度高度相关，那些限制企业进入、阻碍竞争的法律条款减少了利益交换的机会，减缓了繁荣富裕的发展趋势。天津郊区瑜伽铺在建的康庄大道耗费了大量资源，人们为这一宏大项目震惊之际，却忽视了一个真实情况：中国缺乏机构性基础设施以支撑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所谓市场之道，就是首先建立与自由市场相呼应的机构，即私人产权、契约自由度、独立的司法系统和法律条款，然后由投资者对最优规模、企业选址做出合理决策。

在走向市场体系的路上，中国已然取得了显赫成果。然而，应当继续推进机构性基础设施的建立。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呼吁，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原则、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这显然是市场自由化的举措。私人及非政府部门比受到极大扶持的国企更有效率，这不仅体现于工业部门，也体现于服务产业。正如 Lardy 指出，“国有企业会拖累经济增长”。

当市场价格主导经济、调配资源时，消费者也会从中受益——从统计数据不难看出消费者选择面的拓宽。沿海地区的私人部门发展兴旺，提供了数百万计的工作岗位，这对中央委员会推进深化改革起到了一定作用。经济增长放缓是深化改革的机会，然而，这也可能导致政府监管的进一步加强。央行对借贷“阀门”的松动迎合了地方官员的“增长狂热”，这或许对短期增长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投资不当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中国应当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撑及表外贷款将会扰乱市场，同时，反杠杆效应也孕育了资产负债表的危机。

监管控制和信贷分配政策是治标之举，中国需要改革。利率自由化、加强对产权的法律保护，将给予投资者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正在为整个经济体及各机构部门间的再平衡做出切实的努力。

本文原题为“China’s Challenge: Growing the Market, Limiting the State”。本文作者 James A. Dorn 为加图研究所货币学副主席、Cato Journal 的编辑。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最低工资的“清理”作用

Florian Mayneris, Sandra Poncet /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许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于就业影响很小，对此常规的解释包括人员流动率的降低，产品加成的下降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些原因都将部分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冲击。本文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对于那些高速增长的国家有一定“清理作用”——即使得低效率企业被高效率企业取代，同时在位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两个渠道都将使得整体生产率提升。编译如下：

最低工资制度能否在保护低收入人群利益的同时又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学术讨论还是政策辩论中都存有争议。近来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暴乱事件足以说明在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中国，一项民调显示每十个人中就有八个认为现在的中国“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类似的争论在发达国家也是同样存在，一方面奥巴马在 2014 年国情咨文中呼吁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但与此同时，任何实质性的尝试总会遭遇雇主联合抵制。反对者给出的理由是最低工资将削减企业利润，打击就业，迫使他们裁员或是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此外也有知名经济学家指出最低工资的提升可能对低技能劳动力带来极大伤害。

对于中国而言，最低工资的研究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首先，中国工资水平一直很低。2004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 141 美元，远低于美国的 2500 美元，甚至不及墨西哥的 343 美元水平。此外在最低工资标准上，各地区间在水平值和增长率上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给实证识别工作提供便利。但也必须意识到，最低工资标准很可能内生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等因素，因此内生性问题也必须得到处理。

下面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历史沿革：1993 年这一制度被正式引入中国。当时由于各地区间生活水平差异很大，中国政府并未制定一条全国性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将权利下放到了地方，每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依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标准。但当时的最低工资制度并未覆盖农民工群体，同时对于拒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个人、企业也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直至 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终于正式出台，覆盖范围扩大至农民工，对于相应违反行为的处罚力度也大幅加大。规定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应介于当地平均工资的 40-60% 区间内，这直接导致了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提升，尤其是那些原来标准较低的地区。

可以说，2004 年的这一次政策调整是一次有意为之、自上而下的行为，改革的目的除了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外，还有缩小各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的意图。尽管 2000-2007 年间各城市层面最低工资总体而言都呈上升之势，但 2004 年之

后这一势头明显加速。2000-2003 年间各城市平均最低工资年化增长率为 6.9%，但 03-07 年间增长率已经达到 15.5%。同时，03-07 年间各城市间最低工资差异下降了 25%，可以说基本达到了中央当初预想中的效果。

尽管最低工资提升迅速，但对就业的影响却十分有限，可能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政策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其次是最低工资对于企业并不一定是“紧”的约束，或者说大部分企业之前的工资水平早已超过这一标准。这两点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但是在我们的数据中都并未得到支持，下面逐一对其进行讨论。

首先是执法力度，2004 年前，平均工资水平达到或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占比为 88.5%，但 04 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至 93.2%。2005 年数据显示，不仅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比例下降，更关键的是与最低工资标准持平或是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占比明显提高，而这一现象在 03 年之前从未出现过。这就说明我们看到的趋势并不完全是由于整体工资水平上升造成的，至少部分原因是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的加强。

04 年后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提升使得工资水平在最低工资附件企业比例明显上升，这说明之前关于“最低工资约束非紧”的判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最低工资的上涨对于大部分企业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那么为何没有观察到企业层面就业数据的明显变化呢？——我们给出的解释是生产率的提升，这意味着企业能够在不改变雇佣人数的情况下应对劳动力成本冲击。从加总数据上来看，整体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这是因为新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数目相当。而这些新进入企业生产率普遍高于退出企业，同时在位企业也由于竞争加剧而同样经历了生产率的提高。这两种效果都使得宏观层面生产率得以提升，具体而言，由最低工资导致的生产率提升可以解释 2003-05 年间企业、城市层面 20% 左右的生产率提高。我们将其总结为最低工资的“清理”效应。

之前解释企业间生产效率差异以及资源错配的文献多是从技术升级的成本-收益分析角度出发的。由于技术更新需要一次性投资，当工资水平较低时，企业放弃使用先进技术的机会成本也相应较低，这使得在位企业进行技术升级的激励不足，也使得部分低效企业得以存活。而最低工资制度使得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增加，这不仅使得存活下来的企业生产率得以提高，同时也将部分低效企业淘汰出局。这与我们本文的发现是一致的，同时这一结论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原题为“The cleansing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in China”。本文作者 Florian Mayneris 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助理教授；Sandra Poncet 是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载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习近平的印度之行是否会带来重大突破？

Jonathan D. Pollack/文 杜哲元/编译

导读：过去的十年里，中印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改善。而习近平近期对印度的访问亦普遍被认为将产生重要成果。目前，对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最有利的因素是印度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而印度新任总理莫迪也颇为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它对印度的重要意义。但中印两国仍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领土和地缘政治方面。在此次访问中，中印两国领导人批准中国在印度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增进两国关系的一个必要而合适的切入点。现编译如下：

这个周，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决定这两大亚洲大国关系走向的重要时期举行了会谈。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印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双边贸易和双方高级官员会晤定期化的推动下。但是那些长期郁积于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和莫迪现在必须要决定他们是否要准备开启一个更宏大、更持久的伙伴关系了。这需要双方能够超越横亘在两国间的诸多障碍，它们包括：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战略互疑和地缘政治对立、领土争议以及印度源于 1962 年战败所带来的耻辱感。

对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最有利的因素是印度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莫迪颇为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它对印度的重要意义，他为此在上台前曾三次出访中国。他通过在其家乡古吉拉特邦仿行中国经验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这个邦的经济成就的证明，习近平将他出访印度的第一站选定为古吉拉特邦的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中国改进中印关系的另一个举措是把习近平到访印度的时间选在莫迪的六十四岁生日。

中国的巨额投资，特别是在解决印度基础设施需求方面的投资可能将成为两国领导人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此次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有一些高级官员、众多的部长以及来自商业界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各种报告都提到中国可能已经准备在五年内向印度投资超过一千亿元的资金，有些评估甚至比这个还要高。大量的备忘录将在习近平的此次访问中签署，它们包括：工业园区、铁路、高速公路、电网、港口设施、银行以及其他工程投资等。尽管还不知道具体数目，但这已经让莫迪访日所达成的三百五十亿的协议相形见绌。

新德里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中印两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不对称性，它希望在不引发冲突的条件下缩小这种差距。同时，印度对中国的雄心还保持着提防，尤其是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与活动。一些印度人对中国在印度的投资颇为不满，尽管这种不满被印度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所抵消。另外，印度孜孜以求中国的尊重，一个富有铁腕和决断的总理或许会让中国认真对印度。在莫迪与习近平会谈

的开始，莫迪就提醒要解决两国之间的关切与问题，这间接地涉及到了中印两国长期恶化的领土争端、中对巴基斯坦长期的支持以及恐怖主义、气候挑战和能源安全等。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都追求自主和多样的政治身份，如果不能在双边和地区问题问题上达成更广泛的理解，中印两国难以实现持久性的调适。因此，两国领导人批准中国在印度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个必要而合适的切入点。

本文原题为“Xi Jinping in India: Is a Breakthrough Possible?”。本文作者乔纳森·D·波拉克 (Jonathan D Pollack) 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太系列峰会应对亚洲系列挑战

默里·希伯特和格雷戈里·波林/文 郭楚/编译

导读：2014年10月16日美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表文章《亚太系列峰会应对亚洲系列挑战》，作者文章中指出，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Tpp）、南海问题和缅甸问题是美亚太战略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美应利用总统出席亚太系列峰会的机会推动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并给出了作者的具体建议。编译如下：

11月4号的美国国会选举之后，奥巴马总统很快将访问亚洲并参加一系列重要峰会，这些峰会将为美国和地区有关国家应对重要挑战提供机会。这些峰会中首先是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郊区雁栖湖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接着是11月13至14日在缅甸内比都召开的东亚峰会（EAS）。这两个峰会将是奥巴马总统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势的重要平台，而在此前，由于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此一战略的推进受到影响。参加完这两个峰会之后，奥巴马将于11月15至16日前往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参加G20领导人峰会。

1、久拖不决的 Tpp 谈判

随着 Tpp 谈判的久拖不决，贸易和投资问题仍是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日本在5大核心农产品领域始终未能做出大力削减进口关税的承诺，在整个2014年中，12个谈判伙伴国在 Tpp 谈判进程中迟滞不前。奥巴马将利用 APEC 和 EAS 峰会会见安倍首相之机，具体讨论圆满结束 Tpp 谈判所能带来的光明前景，而这也正是安倍当初决定加入 Tpp 的初衷。日本的谈判官员常常声称，除非美国首先保证能够早日取得国会的贸易促进授权（TPA），否则日本不愿意过多讨论他们最敏感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11月4日的国会选举也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选举，此后他将在2015年初谋求获得新一届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以此来促使日本摒弃那些看似合理的借口。由于奥巴马将签署 Tpp 视为总统任期的重要成就，美立法者将需要在2015年中以前——即下一个总统大选期火热展开前，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2、南海问题

在缅甸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各国领导可能回避谈论的最重要的安全议题将毫无疑问是南海问题。在再平衡战略中，奥巴马政府对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战略投入超过经济领域，效果也可圈可点，介入南海问题亦是为此战略服务。去年开始，美政府更加注重长期打算。克里（John Kerry）国务卿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持续呼吁争端各方明确他们的声索诉求和提供声索依据。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Michael Fuchs）今年7月也提出建议，认为各方应在争议地区停止恶化局势的行为，包括搭建建筑物和油气勘探活动。尽管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但这个建议得到了菲律

宾的迅速响应。奥巴马总统应发声为这些倡议做出强力支持，并重申美国政府以和平手段、以国际法为准则管控和解决南海争端的一贯立场。为此，奥巴马应敦促东盟声索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达成初步协议以明确他们的声索权，在争议水域的定义问题上取得可以互相接受的共识，并停止可能恶化局势的所有建造活动和挑衅行为。奥巴马也可以推动这些声索国相互协调，在南沙群岛争议地区联合勘测，以达到防止中国通过填筑工程改变岩石和低潮高度现状的目的。今年，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三个声索国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为这种外交努力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再加上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庭仲裁的行动，这些都将对北京施加相当的外交压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并澄清其立场。奥巴马总统应为这些战略努力提供美国的技术支持，强调和宣传 2014 年初国务院重新开启的“海权的范围”系列研究项目的重要性，该项目旨在于研究、考察临海国家的海洋声索合法性问题。今年 9 月 16 日，该项目发表了关于印尼和菲律宾声索权的新报告。总统应明确指出，国务院将继续发表关于其他声索国南海问题主张的最新报告，以此逐个明确其他相关国家的声索和主张。

3、缅甸问题

在缅甸召开的会议中，除了东亚峰会和美国—东盟峰会，奥巴马也期待与缅甸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与 2012 年他首访缅甸相同，此次美国总统将赞赏这个准文人政府自 2011 年来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所做出的成就。但他仍将推动缅甸领导人朝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不断前进，继续着手应对未完成的艰巨挑战。

首先，奥巴马将与登盛总统以及其他领导人讨论缅甸 2015 年 11 月的议会选举。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特别是美国会看来，缅甸议会选举是观察、检验其政治改革程度的主要指示器和风向标。目前看来，缅甸议会修改宪法第 59 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一条款决定了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无权参加总统选举，因为她有外国公民身份的儿子。同时，宪法第 436 条也不太可能有变化，它规定军人占议会总数的 1/4 席位。2015 年的大选或许将算不上完美，但未来缅甸选举的自由和公平程度将决定美国 2016 年以后如何与缅甸打交道。奥巴马总统或许应该在选举中向缅政党和选举委员会提供更多能力建设的援助。

第二，美总统应敦促缅甸领导层允许包括医生无国界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进入缅甸最西部的若开邦，以接触和救助罗兴亚穆斯林群体。自今年 3 月国际援助者被驱逐出该邦以来，缅甸当局对从 2012 年开始被集中营隔离的 14 万罗兴亚人所遭遇的人道主义灾难不能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自从外国医疗队被迫撤离之后，这些罗兴亚人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医务治疗。

第三，奥巴马将应该提醒缅甸领导人，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缅甸当局与民族地方武装的和平谈判。今年 8 月的谈判结束之后，少数民族领导原先对和平解决

问题的前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但是之后在 9 月的和谈中却感到政府谈判代表中的军事成员不能遵守此前的承诺。没有与少数民族武装的和解，这个国家要实现它的领导人所希望的经济将十分困难。一旦和谈进展顺利，奥巴马应对和谈进程给予最大程度的外交支持，并承诺提供经济援助和解决难民重置问题的援助。

本文原题为“Summits Provide Obama Venues for Addressing Asia Challenges”。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 CSIS 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默里·希伯特，格雷戈里·波林。本文刊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阿拉伯的夏天：灼热的高温还是猛增的暴力？

Florence Gaub/文 李骁/编译

导读：在阿拉伯世界，2014年的夏天被证明是极其充满暴力。伊斯兰国（IS）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并开始进行野蛮的行动（从教派或种族清洗到斩首人质）；民兵组织的暴力困扰着利比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镇压了哈马斯；而叙利亚的大屠杀仍未消减。然而，这一年对暴力的阻止，毫无例外地伴随着该地区似乎正在遵循的一种暂时性模式，这种模式在6月到9月间以回归冲突作为热点。1967年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战争发生在6月；伊拉克与伊朗之间漫长而持续的战争发生在1980年9月；以色列在1982年6月进攻了黎巴嫩（2006年7月再次进攻）；而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8月入侵了科威特。政变似乎也发生在夏季的几个月中：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和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1952年7月推翻了埃及的帝制；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国王分别在1958年7月和1969年9月倒台；而毛里塔尼亚见证了总统在2005年和2008年8月被驱逐。相似地，埃及总统穆尔西的下台发生在去年7月。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有一种明确的观点：一旦庄稼丰收，地面战斗就开始了（正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那样）。但是，除了这种观点之外，是否存在高温和暴力的盛行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本文由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弗洛伦斯·高波撰写。编译如下：

1、炎热的天气？燥热的情绪？

尽管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尚不明确，但有几项研究已试图证明在升高的温度与侵略性的行为之间存在一种联系。例如，在美国的夏天，尤其是酷暑，谋杀率和袭击率都高于平均水平10%以上，若有10天持续在32摄氏度以上，则会有另外7%的波动。对于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暴力发生在夏天，仅仅是因为：由于天气条件的变化，人们与他人接触的机会更频繁，因此也创造了更多犯罪机会。然而，尽管这一结论适用于北半球的大多数情况，它并不适合阿拉伯地区的情况，那儿的气候常年保持干旱和温暖。例如，开罗的温度即使在冬天也很少低于19摄氏度，这使得一年到头都可以进行室外活动。

相比于这一社会学的解释，高温假设认为温暖的天气是暴力的直接动因，因为身体上的不适会导致侵略行为的发生。这一理论得到了“斋月愤怒”的支持：在伊斯兰地区最热的月份，交通事故率和犯罪率都会上升（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会上升9%）。这一情形在2014年尤为明显，当斋戒在7月份开始的时候（每天的日照时间为14个小时，而冬天只有10个小时），炎热的压力，增加了时间上的额外负担。而（仅有的）一线希望是，当斋月回归每年11天，下一次斋月从7月份开始（的年份）将会到2047年。

2、季节和模式

不过，尽管高温与局部暴力之间有一种关联，但不能把它转嫁到地区层面。一项关于1948年以来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冲突的分析认为，（冲突）最盛行的两个月是6月和10月，因而反驳了作为单一解释的“高温假说”。

此外，斋月总体上似乎减少了地区冲突的发生：在 1948 年以来发生的 11 次国家间战争中，只有一次，即赎罪日战争，爆发于斋月期间。在 14 次国内冲突（内战、起义）中，没有一次发生于伊斯兰地区最热的月份。

但是如果地区冲突没有遵循季节，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是偶然发生的？像里维斯·福莱·理查德森这样的数学家分析了战争（包括内战和不对称战争）的持续时间与致死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遵循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于此前发生的冲突。如果该地区陷入冲突陷阱（或者可能是一个圈套）几十年，那么 2014 年夏天的极端情况就是一种累积的结果——可能会由于个人遇到严酷的自然条件而增加。

3、当这只“猫”离开.....

夏天的温度不仅对冲突的盛行或发生有作用；而且，伴随着大部分学校在 7 月和 8 月关闭——在阿拉伯世界、欧洲、美国都是这样，很大一部分人口离开首都（省会）去往更凉爽的地方，或者出国。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伴随着高层决策者的离开，处理危机的人变成了第二层次的官员，而他们常常缺少威信。第二，人员更少的街道促进了作战部队（包括装甲车辆）的快速部署。

这两个方面在 1952 年埃及的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军官组织在开罗占领了关键的基础设施，而此时大多数领导人（包括法鲁克国王）还在亚历山大度假。同样，利比亚军队 1969 年倒戈的时候，国王伊德里斯正在土耳其，而毛里塔尼亚总统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 2005 年被驱逐的时候还在沙特阿拉伯。因此，从统计学上来说，7 月和 8 月是阿拉伯政变流行的月份，正如 9 月和 11 月一样。

然而，假期效应可以在任何季节发生作用。1973 年 10 月对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就是利用了赎罪日假期的战略空白：在犹太地区最热的时间里发动入侵意味着（以色列人）移动相当缓慢。此外，在斋月期间，以色列也受到了未曾料到的攻击，这一行动随后发生在同一时期。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气象学所考虑的问题也很关键。在该地区发起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沙尘暴，它会极大地降低能见度。在中东，这种风主要发生在春季；在海湾地区、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它们更有可能发生在夏季；而在北非，它们发生在冬季。

4、变化的气候，变化的冲突

在中东和北非，夏季还伴随着另一个战略副作用，其中一个可能伴随着气候变化而更趋严重：缺水。这件事，可能反过来又与贫困、食品不安全及移民问题相关联。干旱和变暖不仅摧毁了该地区的阿卡德王国（公元前 2000 年），也导致了已经持续四年的叙利亚内战。2006 年以来降水量的骤减使超过 300 万叙利

亚人陷入贫困，它也自然成为导致当前冲突爆发的一个因素。相似地，持续的降水锐减——以及由此带来的沙漠化——前几年曾使苏丹达尔富尔的冲突急剧恶化。

尽管正在上升的温度可能对气候变化带来全球影响，但它们确实导致了中东北非地区冲突的增加。如果阿拉伯国家不能有效降低这些与气候相关的挑战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对于温度还是暴力来说，未来的夏季都可能会更热。而且尽管高温并不总是地区冲突的原因，未来该地区复杂的边界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也无法管控。

本文原题为“The Arab summer: searing heat, soaring violence?”。本文作者弗洛伦斯·高波 (Florence Gaub) 是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 (EUISS) 的资深分析员。本文于 2014 年 9 月 5 日 刊于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网站。 [点击此处可查看全文。](#)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

简介：AEI成立于1943年，是一家私人的、非党派、非盈利机构，从事政府、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和教育。AEI的目的是通过从事与当前最重要之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为领导人和公众服务。AEI下设七个研究部门：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政治与公共舆论、教育、健康、能源与环境以及社会与文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AEI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7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9名。

网址：www.aei.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The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IFW-KIEL)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简介：IFW研究中心是德国重要的经济智库。它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全球经济热点、经济政策建议、经济学教育。针对全球的经济热点议题，IFW将主要精力用于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并向公众普及相关的经济知识。IFW的专家库涵盖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众多学者，他们的成果将直接或间接地进入IFW的研究与政策建议。IFW对经济学教育有着特别的热情，与全世界最大几所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图书馆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网址：<http://www.ifw-kiel.d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

简介：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2名。

网址：<http://www.brookings.edu/>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